音乐新村的小楼

第一次听程怡说她住音乐新村，怎么也没和上海师大联系上。桂林公园旁上海师大正门的马路对面，过一座小桥，往院里径直走，然后穿过左边的那个小门，就是音乐新村了，眼前右边那排二楼的砖房，中间那家，就是程怡家。我的记忆里门上写着 502 号，但还要程怡来核实，记忆错位也是经常的事。用现在的标准，这是一幢并不算特别宽敞的住宅，楼下是厨房和客厅，还有一个可隔开做书房或个人起居用的独立空间。楼上有十多平方的主卧和一间可做书房或客房的小房间，大概六七平米，这是程怡多年的卧室。楼道不宽不长，却拐了几个弯，所以大件的家具要上二楼恐怕只能从窗口吊了。用现在的标准，这样的居住条件并不宽敞，但当年就是相当阔绰了。尤其是那个客厅，不是大部分人家都有的。

八三年毕业前的研究生考试，我报了上师大外国文学李京波的研究生，要到上海师大考试，因为路程远，程怡就说，考前一天住到我家来吧，因为程伯伯正好外出讲学（或访友）。我是个不会客套的人，于是就堂而皇之住进了程怡家，而且程怡是高规格接待，直接就让我睡程伯伯的卧室。虽然结果是研究生考试考砸了，但来程怡家的趟数增加了不少。跟程妈妈（我们叫“程怡妈妈”）也很熟了，特别是程伯伯当时也有兴致打打桥牌，也有了更多机会去音乐新村。回想起来，跟程伯伯打桥牌是在音乐新村最愉快的经历，并不在乎输赢，享受的是过程。后来听程怡跟我说她爸爸说“戴耘喜欢发表议论”，我自己回忆当时确实喜欢情绪激昂地发表些自己也未必弄清楚的高谈阔论，像程伯伯这样过来之人，经历了太多，反而是天凉好个秋了。当然程伯伯这么说并无批评之意，反而可能认为我性格有可爱一面。我自认为自己是个青少年期滞后的案例，从来是懵懵懂懂，不谙人事，兴趣广泛，一知半解，但对于人文艺术属于可教之类，与程伯伯这样的文史功底深厚的学者交往，自然有亲和性。程妈妈早年在西南联大，学的是心理学，老师是当年心理学的领军人物曹日昌，我后来竟步了程妈妈的后尘。今年年初我去坎昆度假，专门取道造访马雅文化古迹，说起来，最早听说马雅文化还是来自程妈妈的神侃。

我喜欢音乐新村的人和事，还有另一层原因。我从小在石库门里长大。虽然在我的十平方的“亭子间” 里也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但成年后，越来越不喜欢石库门的环境。石库门的街坊邻里虽然有很多互助的融洽，但也免不了搬弄是非，斤斤计较的市井陋习，对于那种照面一脸热乎劲背面就能白眼的做派，我从来觉得很诧异。另外，我父母年轻时移民上海，父亲开始做学徒，后来在立新会计补习功课，做了一辈子会计。父母生性老实本份，没有多少文化，一生的精力都花在把三个孩子拉扯大。所以，我的家庭背景里除了父亲喜欢京剧，

没有多少“文化元素”。这两方面的家庭环境因素使我在音乐新村程家的不同感受就愈加凸显了，这里没有多余的客套，市井的家长里短，这里有能让我脑子开窍长学问的长者。对于我，一个家族中第一代上大学的人来说，音乐新村是一种新的文化符号，另一种生态和心态。

我在音乐新村还有几次清晰的记忆，一次是程怡请一对美国年轻夫妇做客，可能因为她觉得我的英语在同学中还不错，能跟他们做些交流，所以把我也叫上了。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刘昶，和他的怀着孩子的太太。后来程伯伯生病后，程怡全程照顾父亲，那些年就很少去音乐新村了。最后一次见到程伯伯时，他已经卧床不能动了，程怡指着我问她父亲“你还认识这是谁吗？”程伯伯显然不需要费力辨认，眨了眨眼表示认识。这是我跟程伯伯的最后一面。有时回想，假如跟程伯早认识几年，假如程伯伯的身体没有因为文革中的迫害和伤害而迅速衰退，我们是可以成为很好的忘年交的。

八十年代后期，我记得也经常去音乐新村，有时程怡有好的音乐，想叫几个同学一起分享，我也会大老远从上海北端的虹口坐车到南端的音乐新村，那时听的都是古典音乐，如贝多芬第一钢琴奏鸣曲，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等，老季，震明等都是常客。那时，我们同学间还互相写信，我生活上遇到挫折，会写信给程怡倾诉一下，程怡会用大姐的呵护和体贴，回信说，你来音乐新村聊聊吧。八九年二月春节前后，我收到程怡的信，说刘昶在美国读书，很不错的，你为什么不试试。我毕业后 85-88 年间回华师大跟王智量老师念硕士，出国总觉得是别人的事，和自己无关。研究生毕业后那段日子，我事业生活都很茫然，程怡的信突然让我豁然开朗。是啊，出国看看吧。于是参加托福班，GRE 班，九一年赴美，用老温在老季家的告别聚餐上的祝词说，是“奔向自由”。

我最后一次到音乐新村程怡的“老宅”看望程妈妈是 2000 年 10 月，我和我先前的博士后导师一起在上海师大举办一个教师讲习班，我抽空到程怡家小坐，那次见到了朱哲琴，那个有着天籁般嗓音，将《一个真实的故事》，《阿姐鼓》唱红全国的歌手。我 90 年左右在万体馆听她唱过前一首歌，这次近距离接触，更能感到她的清纯，朴实，和灵气。程怡那段时间对音乐，音响的迷恋，对西藏的迷恋，和她与朱哲琴，何训田等的过从直接有关， 当然，也才有了她后来的写西藏的散文集。

后来就听程怡说音乐新村的老房子要拆了盖大楼。再后来，老宅的基地上盖起了公寓楼。音乐新村的小屋已经不复存在，我的许多温馨的记忆留在了那里。但程怡并不过分流露对那小楼的眷恋。程怡不那么小资，矫情。程妈妈以八九十的年龄照样在新楼里有滋有味读她的小说，程怡依旧在她的新的小屋里把玩她的电脑，时不时通报大家她最近的重大发现。生活照常进行，太阳照常升起。我不由想到，这正是音乐新村小屋主人的品格。那小楼承载的是

精神的富足，不需要装点门面，就能吸引各路宾客。那小屋远离尘嚣；在那里，你不会寂寞，因为它给你精神的满足。那小屋不怕被遗忘，也从不在乎某一天从地球上消失，因为它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憧憬那份淡定，伴随我们留下的人生。

（应坚跟我抬杠，要我写篇和美国的经历有关的东西。 但手头事情多，一直静不下心来。昨天读程怡的《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一文，勾起了我对音乐新村的一些回忆。花了一上午，拉拉杂杂写下来，为和程怡 31 年的友谊，也为我们 7903 博客的共同家园。戴耘记于 2010 年 6 月 5 日。 又及，我已到上海，下星期去合肥见见 83 年后未曾见面的江春，期待跟各位择时相聚）